

A

History of Christian Arts in China

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顾卫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A History of Christian Arts in China

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顾卫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 顾卫民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4

ISBN 7-80678-342-3

I. 基... II. 顾... III. 基督教-宗教艺术-发展史-中国 IV.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214 号
图字:09-2004-491 号

本书经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有限公司(香港)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吴放
封面设计 李佳膺

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

顾卫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78-342-3/J·179

定价:6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古代中国境内景教石刻及遗迹

- (一)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诸大秦寺 1
 - 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
 - 2. 长安、盩厔等地的大秦寺 8
- (二) 河北房山县元代景教十字寺及碑刻 14
- (三) 新疆、甘肃、内蒙古及东北的景教遗存 29
 - 1. 新疆和甘肃 29
 - 2. 内蒙古地区 35
 - (1) 鄂尔多斯十字架 35
 - (2) 百灵庙地区 44
 - (3) 阿伦斯木 46
 - (4) 城卜子附近的王墓 54
 - (5) 石柱子梁 56
 - 3. 东北地区 58

(四) 镇江、扬州、庐陵、泉州的景教遗存	60
1. 镇江	60
2. 扬州	63
3. 庐陵	65
4. 泉州	66

第二章 元代方济各会士在华的历史遗存

(一) 约翰·蒙高维诺所记之元大都天主教堂	78
(二) 阿伦斯木古城的罗马天主教堂	88
(三) 扬州出土的元代拉丁文墓碑	91
(四) 泉州方济各会的遗存	104

第三章 晚明基督宗教绘画传入中国

(一) 来华西人所见之古代基督教痕迹	112
(二) 利玛窦与基督教艺术入华	116
(三) 晚明耶稣会上刊印的木刻版画集	126
1. 《福音故事图像》	126
2. 罗儒望的《诵念珠规程》	128
3. 艾儒略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	133
(四) 汤若望的《进呈书像》	145
(五) 16至17世纪澳门的基督宗教题材油画	148

第四章 供奉于清朝宫廷的西洋画家

(一) 郎世宁——融合中西书法的宫廷大画家	169
(二) 郎世宁与西洋透视法传入中国	187
(三) 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	197
(四) 由西洋画家合作的《乾隆平定准部回战图》	203

第五章 明清之际中国各地的教堂建筑和墓地

(一) 澳门的教堂建筑	212
1. 天主教教堂	218
(1) 望德堂	218
(2) 圣劳伦佐堂 (风顺堂)	220
(3) 圣安多尼堂 (花王堂)	226
(4) 奥斯定教堂	227
(5) 圣保禄堂 (大三巴)	229
(6) 圣多明我堂 (板樟堂)	243
(7) 主教座堂	245
(8) 圣约瑟修道院和教堂	248
(9) 氹仔嘉谟教堂	250
(10) 路环圣方济各教堂	251
(11) 主教山教堂	252

2. 炮台建筑	255
(1) 南湾炮台	256
(2) 西望洋山弗兰萨炮台	257
(3) 大三巴炮台	258
(4) 妈阁炮台	259
(5) 嘉思栏炮台	260
(6) 东望洋山炮台及教堂	261
(二) 北京四大堂及南京、上海、杭州老天主堂	263
1. 南堂	264
2. 北堂	273
3. 东堂	282
4. 西堂	284
5. 宁、沪、杭三地的教会建筑	284
(三) 圆明园的设计和建筑	288
(四) 明清传教士墓地	297
1. 北京“滕公栅栏”墓地	297
2. 传信部教会墓地和“正福寺”墓地	315
3. 杭州大方井墓地	325
参考文献	327

第一章 古代中国境内景教石刻及遗迹

(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诸大秦寺

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有关中国古代基督宗教的最早及最确切的文字记录。虽说在景教入华前已有关于基督宗教流行中国的传说^[1],但一般历史学家均以景教碑记录的历史作为中国教会历史的开端。这块著名的石碑立于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1622年或1625年(明天启二年或五年)在西安城外五里的崇仁寺出土,或说原在螭屋^[2]。关于景教碑碑文的注释和研究所在多有^[3],但除了其碑文的重大的信仰及历史价值之外,其碑刻的本身就是融合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古中国基督宗教艺术作品。

景教碑有9英尺高,三又三分之一英尺宽,下有一厚厚的基座。该碑的石材质地呈黑色,是带有很小颗粒的鲕状石灰岩。环碑首的边缘雕刻着两条巨大的无角“螭”龙,这种精灵有着鱼的表皮,但身体的

[1]早在16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沙勿略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及最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都曾谈到过耶稣门徒多默曾经从印度来到中国的传说。他们的根据是度马拉巴教会《每日祈祷文》(《圣务日课》),以及古代东方教会文献《宗教大会教规概要》中的片言只语。

[2]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21-22页。朱谦之:《中国景教》,第73-81页。潘绅:《景教碑文注释》。

[3]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98页。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形状则像蛇，二龙缠绕飞腾，龙尾夹着一颗大珍珠，正好位于碑上方正中央。“龙”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为皇帝所独占，与皇帝和皇家有关艺术充满着龙的造型。碑首用蟠龙或螭龙盘绕的对称形象，是东汉以后逐渐由环纹碑首演变而来的，在中国已有悠久之历史。唐代来华的景教传教士，因与皇帝和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被允许在石刻上运用龙的造型。至于“二龙戏珠”，虽为中国传统艺术常有的形象，但著名的景教史研究专家日人佐伯好郎却有独特的解释，他认为“珍珠”代表着基督教会所有信仰者以及祈祷者心目中信条的化身，是信

仰的表征。在景教碑的碑刻之上，则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1]。因为在东方教会《叙利亚日课经》(East Syriac Daily Offices)里，有这样的经文：“呵，卓越的殉道者马西乌斯(Mar Sergius)! 无瑕的珍珠! 光芒照耀着他的灵魂!”“看见无瑕的珍珠在各各他的顶上”，“在十字架的引导下，他们通过了一座跨越尘世海洋的桥，来到了伊甸园，那是高高在上的珍珠之地，那里是他们居住的地方”^[2]。

在螭龙环绕之下则是三角形的空间，上面镌刻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

[1] 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pp. 12—14. 佐伯好郎：《中国景教碑》。

[2] 同上。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拓本

字。在九个大字之上为一三角形华盖形碑额,其中刻着三个极为特别的暗喻性的象征艺术符号,即十字架、祥云和莲花。

十字架有许多种样式,但最基本的则有两种:四臂等长的正方形的十字架多用于东部教会,横臂较短竖臂上短下长者多用于西部的拉丁教会。前者被称为希腊式,后者则被称为拉丁式。因为古代的景教会在聂斯脱里被流放以后,一直向东部地区扩展和活动,由于他们的传教热忱很高,被称为“火的教会”,是东部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景教碑上的十字架为希腊式,正方形每条等长的十字架臂上都刻有三颗珍珠,而四臂交叉的中央也刻有珍珠,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很特殊,不同于“二龙戏珠”的形象,由此可以推断佐伯好郎关于“珍珠”是基督徒信仰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象征。20世纪初年,潘绅著《景教碑文注释》对景教碑上十字架及“印持十字”碑文的意义作如此注释:

十字架,本为刑具,此罗马之极刑,以纵横二木,合为十字,钉人之手足,竖而举之,使悬木而迟迟以死。吾主被难,实惨死于十

字架，以成救世之功。后人追念其救赎大恩，而重视此十字架焉。主尝曰：欲为我徒，则当克己负十字架以从。见《马太传》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圣保罗曰：但我所夸者无他，惟夸我主耶稣之十字架，我赖之，世向我已钉十字



景教碑头十字架拓本

架，我向世亦然。见《加拉太》第六章十四节。又曰：基督死于十字架，使我敌意不萌，联二为一体，俾得亲于上帝，遂至传和平福音于远近者，赖基督二者以一灵，得谒天帝之人一家。见《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至十九节〔1〕。

这段注解，既是景教碑上也是世上所有十字架象征的宗教意义。关于景教碑上十字架的形状，佐伯好郎还指出：有一位研究教会史的权威认为它仿效了6世纪时罗马主教宗座十字架的原形，而耶稣会士鲁德照(Pere Somedo)则认为它有点像南印度马拉巴圣多默墓碑上的十字架〔2〕。在这个十字架之下雕刻着飞云和白云，在古代中国的雕刻中，道教和伊斯兰教经常有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飞云之下则是莲花，则是佛教的徽号。这样的设计似乎象征着“三教合一”〔3〕。在这个由镶嵌着珍珠的十字架、祥云和莲花组成的图案的两旁，雕刻着两枝爱神

〔1〕潘绅：《景教碑文注释》。

〔2〕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pp.14.

〔3〕同上。

木(myrtle-branches)或是百合花的图案。“百合花”是《圣经》中提到的花卉,象征着纯洁的意味。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面刻有 32 行,每行 62 个汉字,正书,总共不到 2000 字,背面无字。下面和左右两侧都有用叙利亚文刻的 70 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位,除 8 名以外,均为叙利亚文和汉文相对照的。碑文作者为景净,书写人是吕秀岩。

碑文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序文。在这篇较长的序文中,基督宗教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已经用非常典雅的中国文字介绍了当时的中国人。如上帝自有(先先而无元)、三位一体(三一妙身)、创造宇宙(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先造万物后造原祖(匠成万物,然立初人)、救世主弥赛亚(弥施阿)、童贞圣母诞生耶稣,天使欢歌(神天宣庆,室女诞圣)、救赎(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人性本善(素荡之心,本无希嗜)、圣子诞生(三一分身)、魔鬼引诱初人(娑弹施妄)、新约二十七卷(留经二十七部)、十字架(印持十字)、教士一日分七时诵念日课(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每七日行一次祭礼整洁灵魂(七日一荐,洗心反素)等等^[1]。碑文的历史部分则指出,公元 635 年(贞观九年)有“大秦国”(波斯)“上德”(主教)阿罗本,来到京都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到西郊迎迓,接入宫中,“翻经书殿,问道禁闱”,三年后,帝诏命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并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2],到景教碑建立的年代(唐德宗建中年间),景教已到了黄金时代,“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并“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命其兄弟(宁国五王)到寺中设坛行礼,天宝初年,帝又命高力士将五帝(太宗、高宗、睿宗、中

[1] 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詮》,第 3-24 页。又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卷。景净,第 7 页。

[2] 同上。



西安碑林，现保存景教碑的地方

宗、玄宗)“写真画像，寺内安置”，一些教士获得封号，赐紫袈裟，又有“赐天香，颁御饌”的荣宠，又奉旨兴庆宫“修功德”(做礼拜)。肃宗则在灵武等5郡重建教堂，朝令在寺里摩绘帝像。另一位重要的景教教士伊斯，曾在肃宗时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协助郭子仪讨伐北边，“为公爪牙，从军耳目”，并“集四寺僧徒”，并从事社会救济慈善事业，“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1]。碑文最后则为颂词。现历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见解是，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灭佛，景教与摩尼教、祆教一同受牵连，遭到查禁，信徒将此碑埋入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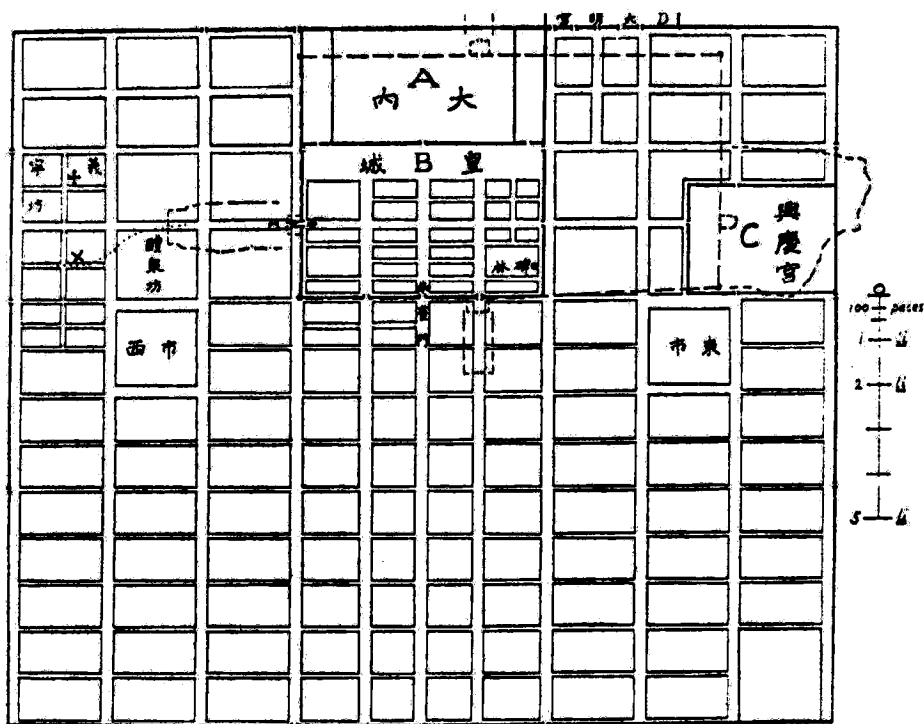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1625年(明天启五年初，约三月)，当时在陕西西安城西或西南三四十英里的整屋县城附近，有工人挖土建屋，从地下数英尺处挖出此石碑^[2]。当时地方官员看了此碑以后，命

[1]同前。

[2]景教碑出土的地点有三说：(1)西安；(2)1625年10月，即景教碑出土后数月，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亲眼见到此碑，他说是在整屋发现；(3)另一位亲见此碑的葡籍耶稣会士鲁德照则说在西安和整屋之间的西安府。

令将此碑移到崇仁寺，此寺位于鄂县路北距西安西门外大约 1.5 英里处。此碑立于该寺，直至 1859 年，才由武林民间一个叫韩泰华的人修了碑亭，但是不久以后便在动乱中被焚毁。1891 年，在北京的列强外交使团请求总理衙门设法保护此碑，且汇出纹银 100 两另建碑亭，但该款到西安时，只剩 5 两，当地人只好筑一瓦轮覆盖之^[1]。但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其间，一位丹麦人何尔谟(Frits Holm)还企图将此碑偷运出境未成^[2]，直到 1907 年 10 月 2 日，景教碑才迁往碑林。

2. 长安、盩厔等地的大秦寺



长安古地图

[1] Frits Holm, *My Nestorian Adventure in China*, pp.63.

[2] 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又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83页。

景教在中国流行以后,中国境内出现不少景教的寺院,这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教堂。据景教碑碑文所叙:“高宗大帝……于诸寺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天宝初……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由这些建寺的情况来看,唐代景教的寺院(教堂)不止长安、洛阳、灵武等处。景教碑上曾提到有名的大秦寺,关于其遗址的地点,《唐会要》上的记载可以作为旁证: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1]。

长安义宁坊,本名熙光坊,义宁元年改名,在街之东北,有波斯寺,即大秦寺^[2]。这与景教碑碑文记载相同。《唐会要》又云:“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基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3]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根据景教碑碑文中“每岁集四寺僧徒”之句,考证此四寺为:1)长安义宁坊之大秦寺由大德(主教)景净驻扎;2)洛阳修养坊之大秦寺,由曜轮驻扎;3)灵武之大秦寺,伊斯本应驻灵武,后因安史之乱以后住于长安附近,故可能去了长安,由一位名与景通同名的 Mar Sargis 驻灵武;4)五郡之大秦寺,由景通驻扎^[4]。同时佐伯好郎根据宋代苏轼《南山行记》诗小序及自注,证明西安附近的整屋有大秦寺。苏轼云:

壬寅(嘉祐七年)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城减决囚禁。自十

[1]《唐会要》卷四十九。

[2]宋敏求:《长安寺》卷十,唐京城四义宁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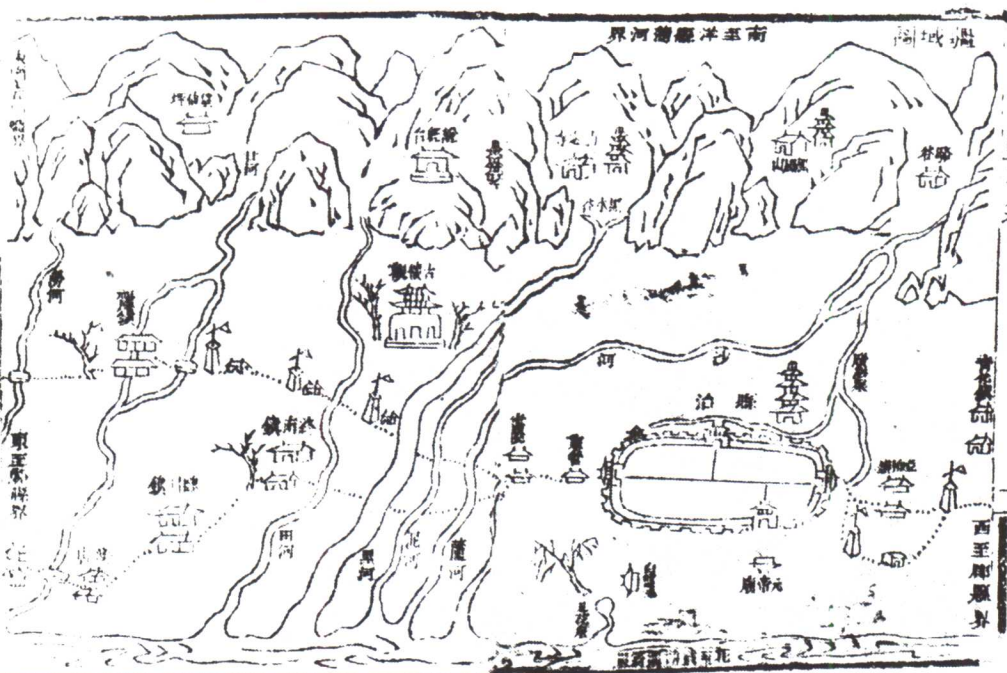
[3]《唐会要》卷四十九。

[4]P.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pp.99-100.

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露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经历者寄子由。

《南山行记》诗自注亦谓：

是日(二月十七日)游崇圣观，俗所谓楼观也。乃尹喜旧宅。山脚授经台尚在。遂与张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别。



同年十一月三日再游大秦寺有诗题曰：

自清平镇游楼观、五郡、大秦、延生，往返四日，得诗寄子由同作^[1]。

佐伯好郎认为大秦寺的遗址在盩厔县内之经南山麓。1933年4月24日，著名的中西交通史家向达先生，偕徐森玉、王以中、刘子植三先生乘车亲往盩厔大秦寺考证。据向达所述，盩厔位于南山之阴，县治距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3-94页。

西安 150 里。大秦寺位于楼观(近代名楼观台,即古崇圣观所在地)。向达等人早发西安西门,偏西行 40 里至斗门镇,20 里大干镇,入鄠县境,又过 20 里至涝店入盩厔县,宿终南镇。次晨由终南镇南行,越阡陌,过乱石河滩,上山坡穿橡树林里楼观,路程 20 里,沿途树木蔚茂,一片江南景象。午后他们在楼观西面 5 里地方见古塔一座,塔旁有一寺院,残破不堪,村童告诉他们这便是大秦寺。在寺中僧侣指点之下,他们找到两块古碑《明正统钟铭》、《乾隆时寺僧墓谒》。向达认为此地地形与苏东坡诗中所叙极为相近,应该就是盩厔大秦寺的遗址^[1]。

盩厔大秦寺很可能是唯一一处现存的有文字以及遗迹可考的景教寺院,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堂之一。那么,从教堂或寺院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是否有任何特征以供寻踪?查中亚地区叙利亚古教会的教堂,与西方罗马教会教堂的形状有相似的地方,礼堂成长方形,堂中左右近墙处,有两排整齐排列的石柱,支撑颇高之穹形顶楼,全座建筑物坐西朝东^[2]。如在叙利亚 Oalat Saman 的圣西蒙(St. Simeon Stylites)的教堂便是这种形制^[3]。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景教传教士在入华以后没有采用西方的罗马式教堂的建筑式样。以盩厔大秦寺为例,无论从文字史料或是实地考察来看,大秦寺应该采用的是中国佛教庙宇的形制。宋嘉祐七年(1062)二月十七日,苏东坡游南山及太平宫,至大秦寺有诗云:

晃荡平川尽,坡迤翠麓横。忽逢孤塔近,独向乱山阴。

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

其弟子由有诗云:

[1] 向达:《盩厔大秦寺略记》,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10-113页。

[2] 赵璧础:《就景教碑及其文献试探唐代景教本色化》,载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0页。

[3] Frederick Hart, *Art, A History of Painting*, pp.297.